

# 大跃进中的新民歌运动

胡光曙



1958年5月，郭沫若与农民诗人王老九赛诗

新民歌运动是中国的“特色产品”，是1958年我国“大跃进”运动中催生的新鲜事物。

是年3月，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批评了新诗。他说：“现在的新诗不成形，没有人读。我反正不读新诗，除非给一百块大洋。”在随后的几次中央工作会议上，毛泽东都提到新民歌问题。他认为“中国诗的出路，第一是民歌，第二是古典”，所以他号召“搞民歌”。“劳动人民不能写的，找人代写。”“大中小学生，发动他们写。”“军队也要写。”4月14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题为《大规模地收集民歌》的社论说：“这是一个出诗的时代，我们要用钻探机深入地挖掘诗歌的大地，使民歌、山歌、民间叙事诗等等像原油一样喷射出来。”

由于领袖发动，全民动员，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伴随着“大跃进”运动就形成了。一时间，中国成了诗的海洋，“工农兵学商，人人是诗人”。人民群众成了新民歌创作的主体，豪情满怀、浪漫夸张的诗歌铺天盖地，迅速传遍全国。像当时流传很广的一首《我来了》：“天上没有玉皇，地上没有龙王。我就是玉皇，我就是龙王。喝令三山五岳开道，我来了！”当时街头诗、墙头诗随处可见。各报刊都辟出大量篇幅，发表新民歌作品。我县（湖南隆回县）农民诗人贺顺生就在刚刚创刊不久的《红旗》杂志发表了一首极尽夸张之能事的诗歌：“瞎眼公公笑开颜，摸来摸去到田边，摸着稻秆高声问：这是谁家竹子山？”邻县一位农民诗人匡荣归一次就在《人民文学》以整整一版篇幅发表了十余首民歌，其中有“大跃进中逞英雄，关公骑马我骑龙”这样豪迈的句子。有的领导讲话也改成了诗歌，如“今

日开会讲三点，第一跃进要争先。”有的应用文也运用了诗歌，如隆回汽车站在售票窗口挂的“登记簿”（当时车票供不应求，购票需先登记）上就写着：“登记簿上有格式，一格只填一个人。如果写了两个号，卖票只卖一个人。”当时，赛诗、展览新民歌已是随处可见的家常便饭，著名作家、诗人也都赶上潮流，纷纷创作、发表了新民歌体诗歌，《人民日报》还登出了郭沫若和农民诗人王老九赛诗的照片。

我当时正上高中。学校当然也要“大跃进”。首先是在学校办工厂、办农场，大搞教育革命，后来干脆停课三个月，步行四日，远征邻县一钢铁基地，去支援生产，并且一边劳动，一边还要创作诗歌。这样的创作虽然活跃，但大家还是嫌“不过瘾”。当时生产大跃进，动不动就说要“放卫星”。有人就提出，我们写诗歌也要放一个“创作卫星”，得到了一致的赞同。经过讨论，我所在连队（当时班级改称连队）就推举我与另一位同学王庚甫二人担此重任。我们摩拳擦掌，一口应承。我在出工时就顺口念道：“早上打开门，雾气满山村，只听脚步声，对面不见人。”“好诗！好诗！”大家一阵鼓掌，马上有同学记录下来，说：“今天放创作卫星的头一炮打响了！”王庚甫同学接着就念：“寒窗十年苦，不如挖年土；劳动一个月，胜读十年书。”马上又被记下，说“这是第二首了！”就这样，我们两人边劳动边想边念，你一首，我一首，直到晚上收工，已完成一百几十首。我们接着挑灯夜战，当记录的同学报出已创作199首时，我马上补了一首，念道：“灯也笑，人也笑，两百篇，完成了！”大家鼓掌，一阵欢呼：“一天创作两百篇新民歌的‘卫星’放出来了！”立即扛起早已准备好的“卫星喜报”，敲锣打鼓，去到团部报喜，领回一面锦旗。

半个多世纪过去了。今日回想起来，那荒唐的行为，热烈的场面，犹在眼前，前些日子，清理篋存旧日文字，我还保存着当年创作这“放卫星”的部分原始记录。

这类的“诗歌创作”，当

时曾被选录、编辑，大量出版。我就保存了一套湖南省由省委办公厅编辑的《大跃进歌谣》，分三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当时出版社出的民歌集子，城乡到处可见，几十首或百余首，就编成薄薄一册，印数很大，公开发行。这些小册子多为50开小本，定价低廉，每册定价3-5分，普及到了每个角落。至于各个单位、厂矿、学校、生产大队自行编选的油印诗集，就更是不可计数了！当时我曾在公社农业中学短期工作，记得第一件事就是搜集整理本校师生的新民歌创作，并编印了一本油印诗集《农业中学一支花》。1959年初，精选全国的大跃进民歌，由郭沫若、周扬编了一本《红旗歌谣》（红旗杂志社出版，1959年9月第1版），共选新民歌300首，配有精美插图二十余页，这本歌谣收录了我的文友曾莺和刘勇的作品。算是记录那段历史的国家最权威选集了。

到了1959年3月，针对新民歌运动中出现的问题，毛泽东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：“叫每个人都要写诗，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？那怎么行！这违反辩证法……放体育卫星、诗歌卫星，通通取消。”

由于领袖的态度转变，各条战线高产“卫星”真相的逐渐披露，尤其是随后到来的粮食饥荒，中国人民的“苦日子”来临了，群众创作热情锐减，除部分作者仍用民歌体写作外，“新民歌运动”也就偃旗息鼓了。

到了“文革”时期，“四人帮”出于某种政治需要，又别有用心地推出了一个“小靳庄诗歌活动”，以宣传、推广“小靳庄新生事物”为幌子，又在各地农村发动群众创作，涌起了一个村村举办“赛诗会”的风潮，可算是大跃进新民歌运动的余响。但为时甚短，其规模与影响，也远远不如“大跃进”时期的新民歌运动了。

（作者为原湖南省隆回县文物管理所所长，隆回县作家协会主席）

责任编辑 肖阿伍

《红旗歌谣》封面

